

打工

徐建融

传统“师傅带徒弟”的学艺方式,大多表现为学生给老师打工,如五代钟隐向郭乾晖学画,“託馆寓食于其家,甘从服役……阴伺其画而心得之”;近世程砚秋先生向荣蝶仙学戏,更加服役。这种教学方式,从今天学校教育的立场看,似乎是“老师剥削学生的劳动力”。可是,当时的学生却多视作最好的学习方式并对老师感恩不尽。

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新世纪初的三十年间,我的主要学历都是在为老师“打工”中度过的。这段经历不仅使我学到了许多,今天想来更使我感到实在是老师们在为我“打工”! 此中,尤以相伴《辞海》编纂五十年的体会为最深。

大约是1975年,《辞海》第三版的编纂正式启动。美术学科主要由上海中国画院的孙祖白、邵洛羊、翁闾运等负责。复旦大学的伍蠡甫先生是画院的编外画师,擅长艺术史研究,所以也参与了负责工作,但不常去。当时的我还在农村种地,因爱好传统文化尤其是书画,所以农闲时常去画院向老先生们请教。看到孙先生他们在编《辞海》,列条目、查资料、写文稿,有条不紊地忙得不亦乐乎,所以也凑了上去,偶尔插几句话、问几个问题。孙先生见我好学又略有悟性,便叫我打下手,到资料室陆俨少先生那里查些文献,或把已经成文的条目排个次序……很得老先生们的好评。

孙先生与唐云先生在同一画室,两张大画桌对面并排。我本来爱好唐先生的花鸟画,现在又对美术史发生了兴趣,孙先生便向唐先生夸奖我。为此,唐先生后来还送了我一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的傅抱石《中国绘画理论》。这本书中的许多观点我后来常有引用,但由于并世的美术史家们似乎都没有见到过这本书,竟说我所引傅的话是没有依据的伪造,傅根本不可能讲这样的话,云云。所以在傅逝世五十年后,我便让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了此书;而1936年的那本商务版至今还保存在我的手中,只是纸张脆到不能再翻动了。

不久,《辞海》第三版和“艺术分册”先后出版,我虽未在书中列名,但因实质性的参与,极大地扎实了我美术史的基础,并考上了浙江美院王伯敏先生的研究生。研究生毕业后,孙先生已不幸去世,伍老、邵先生等继续为辞书出版社编写《中国名画鉴赏大辞典》《中国美术大辞典》和《辞海》的第四、第五版,我便以编委的身份正式参与了,“打工”也打得格外卖力。

进入新世纪以后,在邵先生的推荐下,我承担了《辞海》第六、第七版和正在进行的第八版的主编工作。因此,我又成了《大辞海·美术卷》的第一主编、《美术辞典》的主编和《中国名画鉴赏大辞典》(珍藏版)的主编。所有这些成果,实际上都是在前辈们既有成果的基础上,利用今天更丰富的信息资源和更先进的手段加以精益求精而来的。如果说,当年的这些成果,是作为学生的我在为老师们“打工”,那么,今天的这些成果,不正是老师们为我“打工”的结果吗? 当年,名列编委而有机会帮老先生打工的年轻人不止我一人,唯有我打得最用心、用力,不少人认为我这样做很傻、很吃亏。但随后收获的丰硕成果证实了“吃亏是福,舍出即得”的古训! 今天的学校教育中,学生是否愿意而且明白这样为老师“打工”,实际上是老师在为你“打工”呢?

2025年的书展即将落下帷幕,连续二十一届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。读者踊跃,观者如潮,呈现出申城人们热爱读书,热爱生活的场景。先祖郑逸梅在2016、2017、2018、2023、2024及今年的书展中都有书籍出版发布,我与文坛的学者们为先祖书籍,举办了数次签售活动。

人们爱书喜书的热情,使我不禁忆起潘景郑老先生……

潘老先生(1907~2003)乃著名版本学家、海内藏书家,“宝山楼”藏书拥有者之一,系苏州潘氏滂喜斋主人潘祖荫之侄孙。

老先生于版本目录的研究和考证功力极为精深。例如,唐五代刻本,宋辽金元刻本,明刻本,清代精刊本,巾箱本、套印本、书帕本,以及手稿原本、后人传抄本等,一经寓目,立能审辨。王佩诤先生所著《续补藏书纪事诗》中,为潘老列有专条,其诗云:“滂喜斋溯收藏富,金莲琳琅旧雅园。渊博当今刘子政,玄箸超超七略存。”并附记:“潘子景郑为伯寅尚书后人,富藏书,撰有《著砚楼书跋》,为当世所尊重。”将其比作汉

代校书天禄阁、知识渊博震古烁今的刘向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我曾到访老先生寓所。因距我家较近,传递书籍物件时亦常前往。初次登门造访,颇感好奇,整个房间堆满了书籍。老先生身形清瘦,操一口吴依软语,待人彬彬和蔼,毫无矜矜之态。交谈中得知,他十六七岁时曾向吴瞿安(梅)先生学习词曲,二十岁后从章太炎先生习训诂之学。章太炎先生居苏州时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,潘老先生担任讲师并负责编辑《制言》杂志,自首期至第六十三期。抗战爆发后,太炎先生已逝,其夫人汤国梨与门生在沪上创办太炎文学院,老先生依旧执教其间……他还曾客串昆曲,请教过俞粟庐老人,几度登台,神采奕然。潘老先生多才多艺,于训诂、目录、金石、词曲等学问,俱有精深研究。

老先生曾为拙作题词二帧:甲子年(1984)题红梅四尺整幅,

戊辰年(1988)题昙花图。此二画作后均转赠先祖在香港的老友。老先生词曲俱佳,为拙画增色添彩。

同是苏州人,先祖时常在谈话中提及潘老先生。潘老交往的友朋中不乏著名学者,如郑振铎、汪东(旭初)、黄侃(季刚)、钱玄同、吴承仕、王佩诤等,他们常相互切磋,获益良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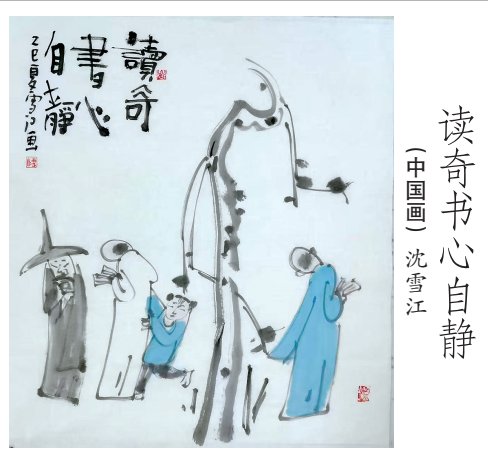
老先生家中藏书二十余万册,摘拾英华,学问宏博。其自著及编校之作有《著砚楼读书札记》《说文古本考外补》《词律校异》《词选笺注》《图书金石题跋》等,不胜枚举! 为纪念其亡兄潘博山,还编印《明清画苑尺牍》、《元明诗翰》等,均为绝世珍稀之文献。

先祖还曾提及潘老之收藏,除金石图书外,蓄砚四五十方,其中有宋代王著砚等,其斋名“著砚楼”便由此而来。所藏诸多珍贵孤本、善本图书及金石拓本万余种,若干年后悉数捐赠予上海图

书馆。潘老曾延请丹青名家唐云、陶冷月、申石伽、凌万顷、朱梅村等绘制《寄溪填词图》,凡数十帧(笔者亦忝列其中),先祖为之作序。《寄溪词稿》积存二千三百首,无不逸宕精严,奇气历落。老先生自己爱好珍藏把玩,无意出版问世;至今十多年过去,此批珍贵画作是否已捐赠抑或散失,就不得而知了……

今年适逢先祖父郑逸梅先生诞辰130周年,五月间于艺苑真赏社举办“逸梅藏画、有慧画扇”展览,同时首发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《郑逸梅友朋尺牍 郑逸梅家藏尺牍》一书。书中收录潘景郑老先生与先祖父往来通信数百通,言辞风雅,谈古论今,互赠书籍,惺惺相惜,极具研究参考价值。

潘公身兼藏书家、版本目录学家、古诗词家于一身,其严谨的学术品格、深厚的治学功底以及爱书藏书的精神,实为当代学人之楷模,值得我们深切学习与敬仰。



南宋初夏,台州人戴复古,去张姓友人家中做客、喝酒,即兴吟诵:

乳鸭池塘水浅深,熟梅天气半晴阴。

东园载酒西园醉,摘尽枇杷一树金。

这首诗,标题为《初夏游张园》。戴复古的张姓友人,名字不详。上海也有张园,紧邻南京西路、威海路,主人姓名载入上海史:张叔和。一八八二年,三十二岁,他以巨资购得此一块地,筑楼台、建假山、掘池塘,供家人在二十余亩园林

里避世逍遥。张园全名“张氏味莼园”,系于一个典故“莼羹鲈脍”。张叔和原籍无锡,最初供职于上海招商局,厌倦倾轧,改走商途,才有实力构建张园,体会晋人张翰的乡思归思。

一八八五年,张园开放,成为华人自由出入的海上名园,每张门票洋银一角,儿童免费。此前,上海西式公园,有“华人无西

人同行,不得入内”之规。

张园内,贩夫走卒纷纷然,达官贵人翩翩然,看花、赏鱼、观虎豹,乘舟、饮酒、做生意。孙中山、蔡元培等名流发表演讲,呼吁共和、进步。四万余人激愤聚集,举行“剪辫子大会”。关涉女性解放议题的“裙钗大会”,振聋发聩。霍元甲打擂台,一拳击倒西洋武士,成就英名。梅兰芳唱堂会,水袖扬,媚眼飞,柔声咏叹良辰美景奈何天,轰动上海滩,确立其名角地位。刘海粟率上海美专师生,举办中国首次裸体模特画展,惹一场小风波……上海的现代性构建,与张园有关。

民国时代的《点石斋画报》、小校场年画、月份牌,屡屡可见以张园为背景的画面:轿车内并肩欢笑的情侣,下班后逛街的职业女性,霓虹灯映照的商业广告……

一九一八年后,张园没落。这一地块,改建成高档车库门社区,拥有二

近日在整理书橱时发现一张1999年7月1日三联书店的购书打印发票,清晰地记录了当日我在该书店买了《历史的真实》《十面埋伏》《中国黑道(上中下)》,共121元,其中购书券抵扣100元。当年单位发的书报费大多是代币券。三联书店店址的前身是“上海书店”,在经济不宽裕、手头拮据的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在上海书店淘旧书还是蛮过瘾的。

1974年1月24日,我在西藏中路新华书店看到一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“中国近代史丛书”,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北洋军阀共十册,我想买一套又想省点钱,于是在该书店买了一本《洋务运动》,价格是0.18元(只有该书封底印有十册书清单),接着赶到淮海中路上海书店淘旧书,遗憾的是当天只淘到六本,直到1974年11月5

日才在上海书店淘到最后三本。我算过一笔账,如买全套的新书需要1.55元,我这套一本新、九本旧的全套十册书共花了1.01元,节约了0.54元,1974年的0.54元对一个中学生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,可以吃一星期的奢侈早餐了。有趣的是1974年11月5日淘到的旧书《太平天国革命》一书在毛主席语录页下签有“张某某购于1973年11月5日”的记录,该老师应该是看完就卖掉资金周转再买新书,而不是像我看完即藏的只进不出者。

上海书店售出的旧书封底都会盖上两个章,一个是直径2厘米的圆形“上海书店”章;另一个是长2.5厘米、宽1厘米的长方形章,上面是“上海书店”四个字,中间是“准”字,下面是旧书价,上中下排列整齐清晰,一目了然。

息传来,所有出版人都动容了——这一决策充分体现了“大上海”对文化发展的担当、对治理能力的自信和对出版事业的坚守。作为一向热爱书展的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团队,更是为之振奋和雀跃。

这年书展,上海聚珍代表中华书局举行了“中华经典通识(第一辑)”等五

周立民馆长刚从外地回沪,按照当时的防疫政策,都不能亲临书展现场。当我们确定要尝试在书展中央大厅做一场多方连线的活动时,被告知书展从来没有举办过这样的活动,连线失败或者突发故障的风险非常大。经过聚珍团队的技术攻关和多次试验,我们终于顺利完成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创新活动——作为主持人,我独自站在中央大厅,和屏幕上的作者、嘉宾进行对话互动。

很多时候,创新是被逼出来的,也是被坚守催发出来的。上海书展这场线上的活动,正式开启了我们的工作新篇章,此后不仅线上活动成了常态,而且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将工作搬运到线上。

2025年书展,期待这方魔力场中酝酿新的“变局”,期待更多的好书、好作者、好编辑从这里吹响号角,从这里出发。

参加《上海出版年刊(2024)》首发式暨座谈会,受邀讲述这卷年刊的编纂情况。

上海书展是一个充满“魔力”的文化盛会——很多书从这里出发后走向了世界,很多人从这里迈上舞台后就一发不可收,很多编辑从这里起步后从小白磨砺成了职业出版人,更有很多出版者从这个盛会里汲取能量成就了长远的发展。2013年身为编辑小白的我,第一次参加上海书展,12年来,亲历和见证了书展里成就的“大变局”。

2015年,书展里成就“大变局”。

作为在上海的出版机构,每年在上海书展推出新书,有如年度工作汇报,是一项极为隆重且有仪式感的事情。作为编辑,书展前的三个月总是有一场场硬仗要打。2015年上半年,我的战场是《晚明大变局》——樊树志教授的一本新著。虽然我已经有两年半工作经验,但独自驾驭30余万字的重磅图书,还是颇为忐忑。尤其在撰写书展海报文案、提炼图书核心价值时,总是感觉笔端力度不够。好在有樊树志先生的包容和领导、同事的支持,新书发布会非常顺利。我长舒了一口气,在新“战袍”陪伴下,我度过了人生中的一个重

要时刻。

新书发布会一结束,我开始收到来自媒体朋友的热烈反馈。在《晚明大变局》一书的托起下,我在上海书展遇到了自己的人生变局——开始忙碌于配合媒体的工作之中:反复提炼修改新书介绍材料,和樊树志先生准备各媒体的访谈,安排樊先生的讲座活动,精选书

摘以及邀约并自己锻炼撰写书评,等等。我们从8月书展一口气忙到年底。

可喜的是,《晚明大变局》到年底共入选了30多个月度好书榜及17个主流媒体的年度好书榜,当年销售6万余册。而我本人,思路 and 视野也随之打开了不少,向全流程的成熟编辑迈出了一大步。2015年的上海书展,成就了《晚明大变局》,也成就了我的人生变局。

2022年,坚守中开启的“大变局”。

这一年,当“上海书展将于11月18日至22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”的消

息传来,所有出版人都动容了——这一决策充分体现了“大上海”对文化发展的担当、对治理能力的自信和对出版事业的坚守。作为一向热爱书展的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团队,更是为之振奋和雀跃。

这年书展,上海聚珍代表中华书局举行了“中华经典通识(第一辑)”等五

场新书发布会。其中,诞生了一场具有“跨时代”创新意义的活动。

2022年可以说是上海出版业的“线上元年”。是年,很多出版社的读书、讲座等活动都搬到线上,我们团队也是如此,不仅建立了直播专栏“书话对话‘聚珍3+1’”,还制作了70余条历史文化小视频,以线上公益活动回馈社会。就是这种奋力迎接新挑战的举措,让我们在上海书展开启了新篇章。

就在《敦煌守望四十天》新书发布活动的前一天得知,作者在苏州、嘉兴

贵雪飞

上海书展里遇见“大变局”

摘以及邀约并自己锻炼撰写书评,等等。我们从8月书展一口气忙到年底。

可喜的是,《晚明大变局》到年底共入选了30多个月度好书榜及17个主流媒体的年度好书榜,当年销售6万余册。而我本人,思路 and 视野也随之打开了不少,向全流程的成熟编辑迈出了一大步。2015年的上海书展,成就了《晚明大变局》,也成就了我的人生变局。

2022年,坚守中开启的“大变局”。

这一年,当“上海书展将于11月18日至22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”的消

息传来,所有出版人都动容了——这一决策充分体现了“大上海”对文化发展的担当、对治理能力的自信和对出版事业的坚守。作为一向热爱书展的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团队,更是为之振奋和雀跃。

这年书展,上海聚珍代表中华书局举行了“中华经典通识(第一辑)”等五

贵雪飞

贵雪飞